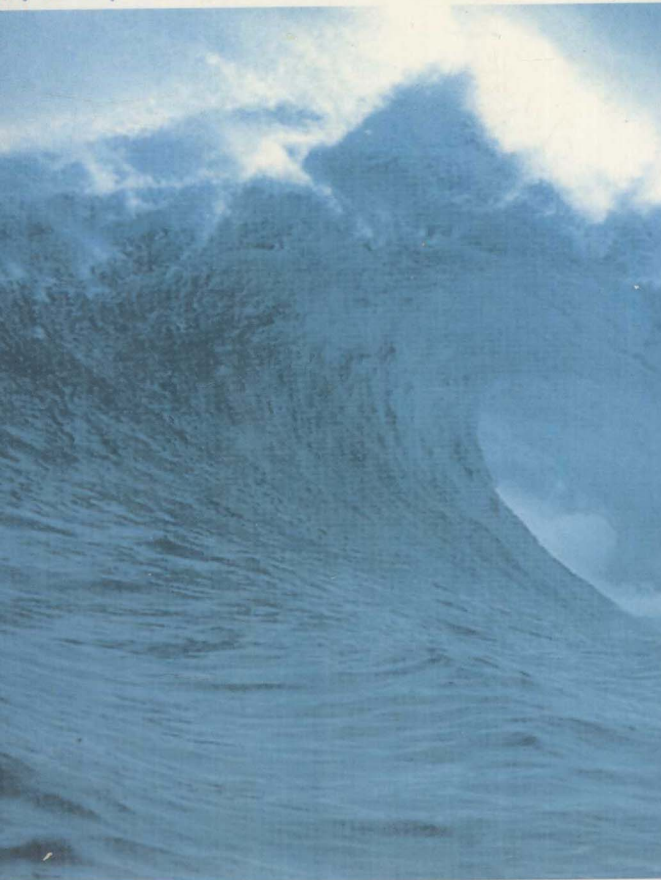


近代中国社会思潮论集

JINDAI ZHONGGUO SHEHUI SICHAO LUNJI

陈胜彝 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近代中国社会思潮论集

陈胜彝 主 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广州·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社会思潮论集/陈胜彝主编.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0.4

ISBN 7-306-01591-5

I. 近… II. 陈… III. 社会思潮—文集—中国—近代
IV. D09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 77419 号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编:510275

电话:020-84111998、84037215)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省番禺市市桥印刷厂印刷

(地址:广东番禺市市桥环城西路 201 号 邮编:511400 电话:020-84881937)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5.125 印张 393 千字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5.00 元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1) 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研究的若干问题 论纲(代序)	陈胜彝
(30)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面对西方双重挑战 的回应	陈胜彝
(55) 清代禁海思想的渊源及其流变	王宏斌
(111) 19 世纪 30 年代在华西人对中国社会经济 特点的研究	郭小东
(174) 鸦片战争与清统治集团对英国军事文明 的认识与反应	马廉颇
(230) 鸦片战争前后的今文经学试探	吴义雄
(277) 倭仁理学思想述论	李细珠
(349) 对西学东渐的回应——近代精英教育的 变迁	贺跃夫
(388)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西文化的冲突	高申鹏
(417) 1876—1885 年中国驻英外交官的经济近代 化观念及其评价	吴宝晓
(449) 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战略思想	刘曼容
(477) 后记	编者

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思潮 研究的若干问题论纲

(代 序)

陈胜彝

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又是汹涌澎湃、波澜壮阔的大海。犹如江河中的激流浪花、海洋上的惊涛骇浪反映了河海运动那样，属于社会意识范畴的社会思潮，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同样，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变迁，正是急剧变化的近代中国社会及其基本矛盾运动进程的反映。因此，要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引向深入，从社会思潮入手，进行综合的总体研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一、关于社会思潮的涵义

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把社会思潮称之为“时代思潮”。尽管他不可能自觉地用社会存在来解释社会意识，从而不承认每个时代都会有反映该时代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进程的社会思潮，作出所谓“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

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这样一个并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论断，并以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等学术思潮，混同“时代思潮”或社会思潮。但是，梁启超对“时代思潮”还是提出不少富有启示性的解释。如说：

“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其时，国民“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焉”；

“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其参加运动之员，每各不相谋，各不相知”，但“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观念……为思想之出发点”，渐而形成风气，“在社会上成为一种公共之好尚”^①。

梁启超的这些解释，又使他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承认了属于社会意识的社会思潮，正是社会存在——所谓“环境之变迁”与“时代之要求”的反映；正是这些社会存在反映到人群中，形成某种“共通观念”、“公共好尚”，推动人群“同趋于一方向”，相与呼应的产物。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侯外庐、刘大年等比较早明确使用“社会思潮”的提法，并对近代中国某些时期的社会思潮作出了初步的但相当可贵的论述^②。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还把社会思潮的涵义概括为“是某些阶级、某些集团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观点、意愿和风尚的总和”^③。

刘德福在1988年发表的《略论“社会思潮”》，则认为“社会思潮是以一定范围内广泛流行的社会心理为基础、以相应的思想体系为代表的思想倾向”^④。这些表述，均从不同角度，力图

对社会思潮作出理论性的概括，具有一定深度。然而，大凡定义，若能深入浅出，简单明确，一目了然，则易为人们所掌握。就此而论，上述众说，则仍有待进一步推敲、完善。

尽管我在 60 年代初就开始使用“思潮”的提法，1978 年以来，对鸦片战争前后的社会思潮和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做了一些探讨，但我对社会思潮的概括，直到 1988 年，《学术研究》才在“动态”的栏目下公开报导，原文如下：

“所谓社会思潮，就是在整个社会中，或在一个阶级、一个集团、一个层次的人群中，形成为潮流的、关于看待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思想主张。”^⑤

简言之，社会思潮就是看待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思想潮流。我想强调的：

一是“思潮”，即思想潮流之简称而已；

二是“社会”，这里指的主要是社会基本矛盾变化中出现的“社会现实问题”；

三是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些“社会现实问题”的思想主张（即所谓“思”），若适应社会之要求、人群之需要，形成为“潮”，其潮势也有大有小，可能波及整个社会，也可能局限于一个阶级、一个集团或一个层次的人群中。

一般说来，凡“思”之形成为“潮”者，均具备如下两个要素：

第一，某种看待和解决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社会现实问题的思想主张，适应了该时空范围的社会要求，体现了历史发展的需要，如孙中山所说的“适乎世界之潮流”，因而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会有共同的反映，尽管反映在各

个领域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倾向却比较一致；

第二，某种看待和解决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社会现实问题的思想主张，体现了该时空范围内人群的共同愿望，为人群所接受，如孙中山所说的“合乎人群之需要”，因而形成在一定范围内，甚至在整个社会中，上下左右相与呼应的“群思”，而且往往与带着一定政治倾向的群众性行动相互联系、相互激荡，乃至汹涌奔腾，大有不可阻挡之势。

由此可见，由于一定的社会思潮，能比较集中地体现该时代的基本特征，加强对社会思潮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时代的脉搏，对该时代人们普遍关注的、迫切要求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作出比较确切的估计；对思潮主要代表人物的历史地位及其思想主张的历史价值，作出比较确切的评价

二、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发展变迁的趋势和特点

近代中国社会思潮，是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而发展变迁的。

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又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演进的。随着人类历史进入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首先登上近代世界的历史舞台。“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①以 1840 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为开端的、从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近代中国社会形态，就是在西方资产阶级力图“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近代东方社会形态之一^②。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卷进了近代世界的政治经济漩涡，以“从属于西方”的附庸地位，处于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之中。在整个近代历史时期，中国所从属的西方，是一个侵略性与先进性

兼而有之、进步性与腐朽性同时并存的双重性的西方。中国各阶级、阶层及其代表对西方挑战的回应，就是如何对待“侵略的西方”与“先进的西方”同时到来的双重挑战。就此而论，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成为中国人以各种不同态度不断回应西方双重挑战的历史。即既是腐朽的统治者甘当西方侵略者的附庸，使中国“从属于西方”，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又是中国人民为摆脱“从属于西方”的命运，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不断追求中国独立与进步的历史。

因此，贯穿整个近代中国历史的正面的社会思潮，或者说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发展的主线，就是近代中国几代人为了摆脱“从属于西方”的命运，解决这个关系到“中国往何处去”的根本的社会现实问题，而谋求中国独立、富强、民主、文明和统一的思潮。简言之，就是不断追求中国近代化的思潮。

就鸦片战争前后到五四运动前后而论，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变迁，以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俄国十月革命“三声炮响”为标志，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追求器物近代化为主的阶段。

这一阶段以英国“用大炮轰开了万里长城，以武力打开了天朝同世界往来的大门”为起点。——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⑧。从而，也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惊醒过来。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五十余年间，“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惊醒过来的中国人，其“觉悟”程度，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只是在“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的进程中，“先从器物上感到不足”^⑨。在这一阶段为追求器物近代化而努力的人们，包括鸦片战争时期出现的，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第一代地主阶级改革派；太平天国时期出现的，以洪秀全、洪仁玕等为代表的开始具有近代意识的农民革命派；19世纪60～90年代，

即所谓洋务运动时期出现的第二代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及随着其分化而形成的早期维新派。尽管他们代表着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各自的政治目标歧异甚大，但在学习西方谋求富国强兵之道，引进西方军事技艺和生产工艺等方面，却大致相同。还有必要强调的：

一是近代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向“先进的西方”学习，追求中国的近代化，从鸦片战争时期开始，是被“侵略的西方”及其用于征服东方的“坚船利炮”等既先进又野蛮的怪物逼出来的。因而，首先是从“器”，特别是从“军器”开始的，即从追求国防近代化开其端的。鸦片战争时期，反映时代特征的则主要是开眼看世界思潮，它承前启后，以经世致用思潮为基础，又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思潮的发端开辟了通途。

二是当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掀起绝对平均主义思潮，去冲击极端不平的现实社会时，以《资政新篇》为代表的效法西方改造中国的方案，把向西方学习从“军器”扩展到“机器”为中心的经济领域；包括洪秀全，亦对“引进欧洲的进步事物、诸如铁路、蒸汽机等类的东西极为赞同”^①，开始突破了历来农民的狭隘眼界。

三是所谓“洋务思潮”，实际上是洋务运动时期，以洋务派为中心，包括第二代地主阶级改革派和随着洋务派分化而形成的早期维新派等各种势力，在历史转换时期——以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建设近代物质文明这个“共通观念”为出发点，相与呼应——为其特征的“自强”、“自救”、“自变”的改良主义思潮。与鸦片战争时期的第一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相比，尽管洋务派倡导的“中体西用”论，继承和发展了“师夷长技”说，有助于中国人进一步开眼看世界并开始走向世界，不能完全否定；然而，洋务派的主要代表旨在维持“中外和好”的思想主张，却从根本上背弃了“制夷”这个“师夷长技”的目的，恰恰适应了西方资产阶

级力图“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战略需要，对解决当时中国社会最根本的现实问题——独立，有害而无利。实践证明，离开独立而言富强，为挽救封建统治危机而置民族危机于不顾，对中国近代化无利而有害。这一时期代表正确方向的是早期维新派。

第二阶段，以追求政制近代化为重点的阶段。

这个阶段以中日甲午战争为起点。正如恩格斯所说：这场“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了古老的中国以致命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①。惊醒过来的这一代中国人的“觉悟”程度，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进一步“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他说：

“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②

其实，在这个阶段，为追求“政制”近代化而努力的人们，既包括戊戌变法前后，“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的以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也包括辛亥革命前后，拿“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为旗帜的，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是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的两翼，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同时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尽管各自提出的救国方案、采取的手段、追求的政制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把向西方学习和否定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紧紧地结合起来。在这一阶段值得指出的是：

一是所谓“戊戌思潮”，实际上是戊戌变法前后，以康梁维新派为中心的，以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为其特征的资产阶级改革思潮。称其为变法维新思潮亦可，称其为改良主义

思潮则失之于含混，因为它把清代，特别是近代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进步思潮，推进到以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取代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新阶段。尽管他们没有打算废弃皇帝，但他们希望把光绪皇帝改造为中国的明治天皇，在实践中举起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战旗，敲响了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第一声丧钟。同时，在近代中国民主思潮发展史上，“创造了自己时代的新哲学”^③，形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④。古典的经世之学，经顾炎武等清初大师为代表的早期经世派，和鸦片战争前后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中期经世派，发展新思潮；传到以康、梁为代表的后期经世派手中，与他们所吸收的西学相结合，就发生了质的飞跃，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新学”，宣告了清代经世致用思潮的终结。西学成了新学的内核。这种与传统的封建主义的“旧学”相对立的“新学”在戊戌时期形成，标志着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新学派初步介绍并运用进化论和天赋人权的民主思想，批判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不变论、君权神授论和封建伦理纲常，为创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立论。可以说，“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⑤。标志着近代民主思潮的勃兴。

二是所谓“辛亥思潮”，实际上是辛亥革命前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中心的，以效法欧美，建立共和，实行民主立宪为其特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比之戊戌思潮，又进了一步。孙中山等以“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把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进步思潮，推进到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取代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高峰。同时，从“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高度，把进化论、天赋人权论等项思想武器，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方案结合起来，宣传民权，批判君权，为创立主权在民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立论，标志

着近代民主思潮的高涨。

第三阶段，以追求人的精神文化的近代化为重点的阶段。

由于从戊戌前后到辛亥前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先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可是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这就不由使他们“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这点觉悟，在“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的进程中，又进了一步。用梁启超的话来说，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①5}。于是，这一代中国先进分子，就把对中国近代化的追求，从以追求器物——政制的近代化为重点，推进到以追求“人”的近代化，主要又是人的精神文化的近代化为重点的新阶段。这标志着对近代民主运动的反思。

这一阶段以“一九一七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为起点——正如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①7}。

所谓“五四思潮”，就是五四运动前后，以陈独秀、李大钊等激进民主主义者和早期共产主义者，通过对近代民主运动的反思，举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进而介绍十月革命、传播马列主义而形成的；它包括以广泛引进西方先进思想文化为特征的民主与科学思想，和在此基础上发端的以“走俄国人的路”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思潮。这一代中国先进分子，从提倡科学精神、民主意识，到提倡社会主义；从倡导弘扬个性，到致力于思想革命，力图以此唤醒中国人的“最后觉悟”，“改造国民性”，提高国民素质，以“人”的近代化促进“政制”、“器物”的近代化，彻底改造中国。

还要强调的是，随着马列主义的传播，中国产生了共产党——正如毛泽东所说——“从此以后，中国改变了方向”^⑭。此后的社会思潮，有待专文探讨，但有一点应当指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近代中国最为壮观的新民主主义思潮逐渐形成和发展，为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往何处去”这个牵动近代以来几代人为之思索、为之探求、为之奋斗的社会现实问题，指明了一条切合中国国情的，走上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综观近代社会思潮，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交叉重叠性。

从鸦片战争前后到五四运动前后，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谋求中国近代化的三个发展阶段，不是各自孤立、互相分离的，而是既各有重点，又呈交叉重叠状态发展的。在追求“器物”近代化为主的阶段，林则徐、魏源、梁廷枏等人，就曾对美国、瑞士和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制，作过介绍，为后来中国资产阶级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学说，作了“创榛辟莽”的工作。同样，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也不仅留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工业和经济制度，而且了解到英美富强，在其“法善”^⑮。据说，有的人还“十分熟悉欧洲的政治”^⑯。在追求“政制”近代化为重点的阶段，不但追求“器物”近代化有所发展，而且在引进西方先进思想文化，追求人的精神文化近代化方面，也作了不少工作。诚如梁启超所说：“第三期新运动的种子，也可以说是从这一期（第二阶段）播殖下来。……严复翻译的几部书，算是把19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进来，可惜国里的人能够领略的太少了。”^⑰梁启超有所领略，所以他早在1902年，就强调“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谓“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⑱。抢在“五四”之前

就把“人”的近代化问题提了出来，并设计了一个“淬厉所固有，采补所本无”的“新民之道”^③。同样，孙中山在领导推翻帝制，创立共和同时，也提出仅仅推翻皇帝制度还不够，“尚有一层最要紧的”，就是要肃清“皇帝思想”^④。到了追求人的思想文化近代化为重点的阶段，发展实业，建设“最新式的共和国”等追求器物、政制近代化的努力，也在同步进行。

第二，爱国性与进步性。

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发展变迁的进程，实际上就是中国人回应西方双重挑战的进程。实践证明，闭关自守、顽固守旧，只能导致误国；妥协投降，甘当附庸，只能称之为卖国；只有学习“先进的西方”，抵抗“侵略的西方”（以及抵制“腐朽的西方”），才是真正的爱国。因此，在近代中国，爱国与追求进步，振兴中华与开放革新，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爱国性与进步性，互相渗透，相辅相成，具体表现为近代一批批先进的中国人为追求中国的独立与进步，不断冲破闭关主义的牢笼，紧跟世界历史前进潮流的实践。这点在下面还将论述，这里要强调的只是，这些先进的中国人，从抛弃“闭关锁国”的爱国主义，到抛弃“忠君爱国”的封建性爱国主义，从追求旧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到追求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使中华民族的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得到最充分的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的观念，在近代中国不断更新，不断注入求进、开放、革新的时代精神。

第三，不成熟性。

如上所述，近代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追求近代化，是被“侵略的西方”逼出来的。这一历史任务的提出，首先是为了挽救民族危机；解决这一任务的物质条件、阶级条件和社会基础，并未具备。因此，在近代社会思潮发展变迁进程中，反复出现种种不成熟的现象，而且往往出现在其代表人物，包括站

在正面指导潮流的伟大人物身上。

一是简单片面。特别是看待社会现实问题，简单化、片面化的情况，甚为普遍。

二是急于求成。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思想主张，往往愿望良好却不切实际。要靠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办到的事，想在短期内就能实现。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时，谓“一年而习，二年而可精”，“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②。到孙中山提出十年修二十万里铁路等雄心勃勃的计划，以及宣告奋斗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奋斗三、五年“即可与外国并驾齐驱”；奋斗十年“必致中国于美之富、于德之强”等等^③。急躁则冒进，欲速则不达；期望过高，往往失望越大。

三是传统包袱太重。最先进的思潮往往与最落后、最腐朽的意识并存、混杂；最时髦的概念，往往被变成表达旧思想的工具；近代化的主张，往往要靠着“古圣先贤”才能推行；近代文明往往被纳入中世纪的框架之中；如此等等，严重地制约着先进思潮的发展和近代意识的形成。

四是好走极端。基于上述情况，诸如从盲目自大到无根据的自卑，从高度狂热到悲观失望，从一哄而起到一触即溃，高潮来得快、也退得快，等等现象皆颇常见。

三、闭关主义与开放主义

在社会思潮范畴内，闭关主义与开放主义，是两种自成体系的，看待和解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思想主张。这两种思想主张，实质上反映了主要是由两种互相对立的思想路线与方针政策体现出来的两种世界观。归根到底，是中世纪与近代两个时代，个体小生产与社会大生产这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在思想和政策上的表现。

在近代、清代，在看待和解决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特别是与西方世界的关系问题上，闭关主义，以施行闭目塞听的思想路线和闭关锁国的传统政策为特征，以维护封建经济基础和封建专制统治为目的；开放主义，则以奉行放眼看世界的思想路线和倡导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国际交往，特别是奉行向西方学习，推动改革的政策为特征，以谋求中国的独立和进步，振兴中华为目的。

提出这一问题的意义在于：

其一，有助于我们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明确闭关主义与开放主义的时代属性。

一般地说，闭关主义，是中世纪的象征，从属于封建主义；开放主义，则是人类历史发展到近代，世界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产物，从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中国而言，在中世纪时代，不论是哪一位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采取哪一种“开明”的政治经济措施，包括放宽对外交往的限制，甚至对外商施恩赐惠，都不过是传统的华夏中心主义及夷夏观念的反映。从明朝的永乐大帝宣布对“慕义远来”的外商免收商税，谓此等“逐末”之举，“所得几何，而亏大体多矣！”^②到清朝道光皇帝，把断绝中英贸易作为对“该夷等不知感戴”的惩罚，叠谓“区区税银，何足计论！”“区区关税之盈绌，朕所不计也！”^③说明直到明清，封建统治者无论是扩展还是收缩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都以扩展或维护其皇威为转移。把某些封建帝王采取某些“开明”措施，扩展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誉为“开放”，似乃值得推敲。因为，封建主义，本质上是封闭的，尽管其封闭范围时而扩大时而缩小；开放主义，则标志着人们的世界观念的形成及其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种世界观念的形成和世界历史性的活动，又是与各民族的历史，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